

Chinese View of Sibuzawa Eyiqi

Jian ZHO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涩泽荣一的中国观

周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Keyword: Sibuzawa Eyiqi, Viewson Chinao Great Asianism, economic expansion

Abstract

Sibuzawa Eyiqi, as a prominent leader of the modern financial sector in Japan, alway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Japan's economic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abroad. However, since his views on China,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in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his position on economic expansion in China wa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is reveals a particularity of Sibuzawa Eyiqi's think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Sibuzawa Eyiqi has rarely paid attention to this aspect. This paper is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 issue, by 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his views on China, and providing analyses and comments on the "benevolent doctrine" advocated by Sibuzawa Eyiqi in his position concerning Japan's economic expansion in China.

内容提要

涩泽荣一作为近代日本财界的领袖人物，在近代日本对外经济侵略和扩张活动中始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中国观与近代日本社会的主流中国观有很大差异，受此影响，他所主张的对华经济扩张路线与日本政府并不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独特之处。而以往的涩泽研究对此似乎少有涉及，故本文拟就此作个补充，试从几个方面介绍和解读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并对其主张的“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做个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林林种种各式各样，

且伴随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处境的变化，居主流地位的中国观也在变化。在鸦片战争之前，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之地无疑是值得敬仰和学习的国家。然而，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开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再到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以致成了颇受鄙视和侮辱的对象。日本主流中国观的这种变化一直在制约和影响近代两国关系的进程，对推动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观，主要指的是在思想主张上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那么，涩泽荣一¹究竟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呢？他主张的中国观与日本的主流中国观有何异同之处？在现实中他的中国观给他的对华经济扩张活动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主流中国观及其变化

明治维新后，以新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三大方针为指南，日本社会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经济迅速崛起，国力大为增强。以此为背景，西方近代文明和价值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被当作重新认识亚洲邻国的出发点。而这其中，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文明启蒙家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他所主张的中国观可以说是最具影响能力和

¹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实业家，他致力于引进和普及西方的股份公司企业制度，一生亲自组织和参与创办的近代企业多达500余家，这些企业遍布几乎所有的近代产业部门，为近代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被后人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在近代日本对外经济侵略和扩张中表现活跃，始终扮演着策划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人物。

代表性的。

福泽渝吉崇拜的是西方文明史观。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个介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之间的半开化社会。中国不仅人情风俗卑鄙低贱，根本不能称之为礼仪之邦，²而且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之强的传统观念，这样愈视君主为神，就愈加陷于愚昧。³他认为，这种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的顺从和封建主义纲常伦理的维护又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他对汉学和儒家思想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而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⁴尽管“儒教虽然主张所谓的仁政，但实际上是极为虚伪的，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⁵因而他主张，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的儒学，⁶并直言不讳地提出：“当今得治世家如果真的担忧社会上的轻浮、暴躁者，就应该引导少年们认真地学习西洋学，此外别无好办法”。如“将孔孟之教定为基准，来制止今日的人心波动，束缚人的思想，以便经营文明昌盛的社会事业，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以我来看，简直就是极端的迂腐，极端的轻浮行动”。⁷福泽渝吉不仅坚决反对日本再用儒学来教育后人，而且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虽然也在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改革兵制，但这些做法求的只是“外在的文明”，并没有涉及“内在的文明”。中国仍然固守照原来的政教风俗，如此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难于自保，而且日本也会因有了这么一个邻国而受到巨大的不利影响，这真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那么日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呢？福泽渝吉直言不讳地说，“亲近恶友不免沾上恶名，我从心底里谢绝亚细亚东方恶友”，并断言：中国“从现在起不出数年必然王国，其国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隔，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此他认为，日本不能作袖手旁观者，而只能“脱亚入欧”，“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⁸他说：日本“不能等待邻国开明来共兴亚细亚，应该脱其伍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与中国、朝鲜交往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有所照顾，完

全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⁹正是出于这种思想，福泽渝吉一直都在积极的鼓动和支持日本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道路，对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感到兴奋不已，将这场侵略战争说成是“文野之战”，是“谋求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文明开化进步者之间的战争”。¹⁰并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而激动不已，极力欢呼“今天邻国的中国、朝鲜也被包罗在我文明之中，实在是毕生的愉快，真的是喜出望外”。¹¹

福泽渝吉中国观的最终归结在于主张日本“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为伍共同瓜分和吞食中国。这种思想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在日本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成以致迅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甲午战争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日本通过发动这场战争达到了称雄亚洲的目的，西方列强由此不能再视日本为等闲之辈，而貌似庞大中国却不堪一击沦为战败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因此，从这时开始日本朝野谈论中国时最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可否挑战中国、应不应该与西方列强为伍的问题，而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西方国家并控制中国才符合日本最大利益的问题。以此为背景，社会上流行的中国观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在日本人的眼里，西方世界已不是所向披靡不可战胜的象征，因此人们对福泽渝吉所主张的“脱亚入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热衷和追捧，而取而代之，“大亚洲主义”所主张的中国观则唤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或认同。

在日本，所谓“大亚洲主义”有着较长的思想源流，它在明治初期就已形成，但在后来不同的时期里，其视角和观点因人因时而各有所异，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内容复杂多变，而之所以均称之为“大亚洲主义”，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提出了“亚洲同盟”和“中日连携”主张。甲午战争以后，“大亚洲主义”主张者重整阵容，出现了一些新的代表性人物，在这其中，冈仓天心、近卫笃摩、陆羯南、小寺谦吉等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冈仓天心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美术家，他提出的“亚洲一体论”分为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从文化方面，冈仓天心有着深厚的儒学情结，他对亚洲文化极为推崇。他说，亚洲本为一体，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之一思想的印度文明”，¹²并被所有的亚洲民族共同继承。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亚洲文明远不仅在古代是最先进的，而且到了近代也没有过

² 参见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43 页

³ 参见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17 页

⁴ 参见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17 页

⁵ 福泽渝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15 页

⁶ 《福泽渝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43 页

⁷ 《福泽渝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44 页

⁸ 《福泽渝吉全集》第 9 卷 195-196 页

⁹ 《福泽渝吉全集》第 10 卷 238-240, 159-162

¹⁰ 《福泽渝吉全集》第 14 卷 491 页

¹¹ 《福泽渝吉全集》第 18 卷 637 页

¹²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82 页

时。遗憾的是中国文明从元朝起由于外族入侵而被割断，文化的精髓丧失殆尽；而印度文明也因会教徒和利益熏心的欧洲人的破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而只有日本是亚洲文明的集大成者，这是因为日本民族具有神奇的天性，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因此日本不应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应该与亚洲各国为伍，担负起领导复兴亚洲文明的神圣使命。而在政治方面，冈仓天心认为，亚洲各国要扫除白种人的威胁，就需要联合起来，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因此理应承担“亚洲一体”的领导者。在他看来，日本至今所为都是不容置疑的。他说，日本没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企图吞并朝鲜所致，而中国反抗日本是受了白种人的挑拨，等等。

而另一位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近卫笃摩提出的基本主张则是“同人种同盟”“支那保全论”。在近卫看来“西力之东渐”实质上就是白人对东方有色人种在人种上的歧视；亚洲与西洋的对垒，实际上是黄、白人种的对垒，在这种情况下，“支那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白色人种的仇敌”，“支那人民的存亡，决不是他人的休戚安危，而是与日本人自身利益相关联的东西”，他还说，“东洋实为东洋之东洋，东洋问题之处理，固属东洋人之责任。清国国势虽衰，其弊端在于政治，而非在于民族，（彼与我）共同携手以从事保全东洋之大业绝非难事”。¹³

从冈仓天心、近卫笃摩的上述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所要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日本不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军事力量等方面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应该理所当然地担负起领导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使命。这就是说，他们所鼓吹的亚洲一体指的并不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平等联合，而是一种支配与从属、无平等可言的国家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日本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实行侵略和干涉政策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成为亚洲发展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合理的行为。而这样的主张在陆羯南、小寺谦吉等人的言论中也多有所见。如陆羯南把日本对中国的扩张说成是为了解决“东洋内部问题”，是为实现两国的提携而对中国进行的“改造”；小寺谦吉反复声称，日本继承了中国文明，有资格做东亚的盟主，日本目前最迫切的是“帮助”、“指导”中国，与日本一道为实现“大亚洲主义”而努力。显然，这样的“大亚洲主义”已不再是甲午战争之前的那种主张“合纵连衡”的“大亚洲主义”了，在性质上发生了异变。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瓜分中国的成员国，西方列强不仅随之成了它的伙伴，也成了它的手。然而，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一西方列强制定的瓜分规则之下，日本要实现独霸中国的愿望就需要另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那保全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战略含义。首先，保全支那，

可以使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正当化；其次，将瓜分对象变为“盟友”，显然比日本单独与西方国家争斗抗衡更有力量，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之后的“大亚洲主义”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中国观，它表面上主张的是全亚洲的复兴，而实际上充满了对中国的鄙视，期待实现的是对全亚洲的单独支配。因此，它不仅被诸多的政府官员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故此成为继“脱亚入欧论”之后在日本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

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及其与主流中国观的不同

涩泽荣一一生与中国之间的关联相当密切，他是在汉学的教育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曾先后两次专程访问中国，与中国各界人士有相当广泛的交往。而另一方面，他作为日本财界的领袖在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说，他对中国的关心和了解远非一般人所能比及，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变革、经济状况以及中日两国外交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和主张，且不乏独到之处，因此值得解读。

孔子观

了解涩泽荣一的中国观无疑应该从他的儒学观特别是论语观说起。他厚爱儒学，对其经典《论语》格外崇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指导人们安身立世、平定天下的学问，孔子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偶像，而是一个可以学习模仿的平凡而伟大的人；他还认为，《论语》的魅力在于靠近社会实际，讲的都是为人处事的方法和为人所应该遵守伦理道德，而这些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失去价值，依旧可以被当作人们从事企业活动的规矩准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说，号召日本的工商业者都来学习孔子的《论语》，做一个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新型企业家。在涩泽荣一看来，《论语》所阐明的王道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智慧，吸取这一思想的精华对日本处理内政外交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仁字可以看作是孔子的生命，也是论语二十篇的血液，如果把仁字从孔子的教诲中拿掉，就如同把辣椒的辣味去掉了一样。为了仁孔子甚至可以达到奉献生命的程度，他的一生始于求仁，终于行仁，孔子的神与髓都在于一个仁字。……孔子一方面把仁字当做道德伦理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政治的本义。王政王道就是以仁字为出发点的”。¹⁴他说：“不论贫富贵贱，人以王道为怀，把王道当作为处事之准则，无疑胜之百条千条法律或规则”。¹⁵他还说：

¹⁴ 涩泽荣一《论语讲义》23页

¹⁵ 涩泽健《巨人涩泽荣一构筑财富的百条教诲》讲谈社2007年，190页

¹³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0-51页)

“忠恕是孔子一贯坚持的精神，也是贯穿于论语始终的精神”，“无论是处世还是外交，其根本都是相通的。如果不能以忠恕精神所面临对待，都不能顺利地进行并取得彼此都感到满意的结果”。“忠恕精神在对支那外交上是必不可少的，在对美国的外交上也是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也像个人与个人交往那样需要忠恕精神，……. 无论在哪国和哪国之间，国交之所以出现破裂，其原因常常就是因为缺乏忠恕精神。圆满的国际关系通过相互间的忠恕才能得以实现。”¹⁶ 总之，在涩泽荣一的思想里，论语就是一部安邦治国的经典指南，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它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并非水火互不相容，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它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光芒，因此继承和实践孔子在论语中教诲将使日本受益无穷。

2、辛亥革命观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随之崩溃。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震惊了整个世界，也引起了日本的极度关注。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涩泽荣一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此次支那革命军的爆发乃是自然之命运，并不足为怪。满朝称霸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其治世之方依于威力政治，满人独占首脑处庸主地位。与此相反，汉人则被视为蠢人而被置于被庸者地位。……然孔子之教乃为支那之国教，其毕竟之处在于鼓吹革命。所云治国也好，平天下也罢，其所至终极之处，非革命而别无他途。国民思想既有这样的根底，加之最近受文明思潮所影响，支那人出游海外，对外国情况已有所知，有机会就国势如何进行比较对照。可正值此时，满朝却完全不知须相仿尧舜行三代之治故革命思想不能不勃然而起……。¹⁷ 也就是说，在涩泽荣一看来，清廷的覆没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是无法避免的。其原因在于满人统治的朝廷只知行霸道之治，而不知以王道为本才能取得民心，故把汉人置于被压迫的地位之上，而这在以孔子之教为国教的支那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除了革命没有他途可走。而西方文明思潮的影响以及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比较，也对唤起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见，涩泽荣一是以他儒学思想为出发点来解读辛亥革命的，他所强调的是，辛亥革命是清廷实行霸道统治和背离孔子之教的结果，这种观点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他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也就等于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因而有值得积极评价的一方面。

涩泽荣一还对辛亥革命对日本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当时日本朝野十分关心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政界有很多人认为，如果主张实行共和制的临时国民政府和革命军统一了中国，那么很

可能会给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为此颇为忧虑，甚至试图以清廷接受君主立宪制式的改革为交换条件，向清廷做出不支持临时国民政府和革命军的承诺。而涩泽荣一对此并不赞成，他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花费更多的脑筋。他说：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君主立宪制在日本具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即便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政体，对日本政体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不主张对中国的政体加以干预。他说：在清国，满汉两个民族的反目相兼已非一朝一夕，何时引起变乱早就为人所预料，而从今日之形势来看，不难推测，早晚必变，不是君主立宪制，就是共和制。有人把清国这次变乱与我国维新同而视之，以我之见，彼此之间的国体组织、性质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国有朝暮两者之政争，与清国满汉两族之间斗争在形体上不能说没有相似之处，但眼下清国变乱和我国朝暮两者之政争在思想精神上有根本差异。虽然当时朝暮两者之政争非常剧烈，但与国体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政权的奉还、废藩置县等大事没有流血就完成了。一部分论者担忧，清国政体的完全改变将对我国国体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次变乱是国民意志得以发动的结果，假设清国建立了共和政体，对我国政体上可以说几乎没有影响”。¹⁸ 不过，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涩泽荣一并没有因为提出的这一观点而主张对国民临时政府和革命军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姿态。他虽然认为，辛亥革命尤其发生的必然性，但这场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还是难以预料和估计的，因此认为日本应该静观其变，继续采取谨慎和“中立”的态度，并同时认为，不管中国的政局怎样变化，中国作为日本今后最有希望和潜力的海外市场不会改变，日本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并尽快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说：清国变乱安稳之后，其文物百般能否得到迅速而有秩序地发展、其面貌能否焕然一新，对此我辈尚有疑虑。我以为清贸易眼前完全处于休止状态只是一时的现象，不必悲观，如一朝使此次变乱平定下来，即可看到显著的增进，故不难想象我对清贸易将呈现意外的生机。唯需对我等同行提出警告的是，对清国市场即将出现的世界性商战须有充分的准备，制定方略，以不误将来之大计。¹⁹

3、“日支经济同盟论”与“支那保全论”

涩泽荣一作为日本经济界的代表人物，他从明治维新成功之后便把中国和朝鲜纳入了他的视野，认为日本的经济崛起离不开海外市场的扩大，积极主张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经济扩张活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是今非昔比成为亚洲唯一可以与西方列

¹⁶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 84-85P

¹⁷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 544P

¹⁸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 537 页

¹⁹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 537 页

强讨价还价的强国。面对这种变化，涩泽荣一不仅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日本要确保自己的国际地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建立“日支经济同盟”，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范围。他说：“就我帝国政治经济的将来而言，现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与支那的关系问题”。

“无论从历史上的关系来看，还是从其国土、人口来观察，特别是考虑到其尚未开发的天然的富源等，我帝国都负有与西邻的支那共同携手保护亚细亚大陆的责任，这是日本理所当然的使命”。²⁰“支那提供原料，日本进行原料加工，并用以满足支那的需要，这完全符合互通有无的经济原理”。²¹因此，“我从很久以来就提倡日支经济同盟，使两国因在经济上有相同的利害而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实现两国的亲善和两国的提携”。²²但同时他又说“支那人是个利己心很强的种族，做事总是算计自己的利益，缺乏经营股份企业的力量，如把股份企业完全交由支那人经营，未必经营得好，甚至最终归于失败。因此，无论做什么，日本人都应承担首脑，对其进行指导”。²³涩泽荣一甚至还说：“从地理上或从历史关系上说，我国都必须成为东洋之盟主，以开拓清、韩之文明，决不可仅满足于今日之京釜铁路、京义铁路和长江航行权等等。尤须注意者，是战后欧洲列强皆更着眼于东洋，拼命扩张其商权，而我国有鉴于此，当更明确意识，我国不但须在利权竞争上不弱于彼等，还需更进而超出彼等一头地也”。²⁴从涩泽荣一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的所主张的“日支经济同盟论”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建立日支经济同盟可以确保日本的原料来源和海外销售市场。其二、开发亚洲大陆和中国，还有“扶翼清、韩之文明”是日本的责任和使命，日本是“日支经济同盟”乃至整个东洋理所当然的盟主。其三、通过“日支经济同盟”的建立，在与西方列强国家的剧烈争夺中取得主动和有利地位，并最终压倒群雄，最终实现独占鳌头的目标。

在涩泽荣一看来，日支经济同盟的建立关系到日本经济的未来，但要实现设想目标的目标，日本需要确立独自的支那政策。他说：“观支那之国情，至欧洲大战爆发之前为止，英国以扬子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德国占据山东省和胶州湾，俄国占据北满洲和外蒙古，法国占据广东、广西的南部，相互竞相扩张商圈，可谓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露出吞并领土的爪

牙。本来在日英同盟条约中有保全支那的领土和机会均等条款，但实际上机会均等和扩大商权是否能够满足列国的野心很值得疑问，因此与支那有唇齿相依关系的日本实有重大责任”。²⁵那么，日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形势呢？涩泽荣一接来说：“然我国的支那政策如何为好？依我之见，首先应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和保全领土为根本方针。鉴于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和日支两国在历史、地理上的关系，应始终以善邻之谊为重，尽指导启发之责任，以彼此的经济合作为目的，以求发展。日本抱领土上的野心，分明会开列国瓜分之端，招致唇破齿寒，故绝对不能赞成军人或一部分浪人所抱有的那种激进意见。而且，对作为独立国的支那毫无敬意，傲慢指教，或警告威吓，实行高压干预政策，结果不仅会增强他们的反抗心和猜疑心，还会导致强烈的误解，所以只要不损害我国的优越权和东亚盟主权的尊严，我们就不应轻举妄动”。²⁶这就是说，涩泽荣一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不满足机会均等进而采取瓜分领土将中国完全成为附属国，这将给日本继续扩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制造巨大的障碍。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保全中国领土和独立国地位的政策，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牵制西方列强瓜分活动的升级，回避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军事冲突，而且有利于得到中国的好感，拉近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使“日支经济同盟”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从而保持“日本的优越权”，保证日本从中得到比西方国家更多的利益。

4、日支亲善论

在涩泽荣一看来，建立他所积极主张的“日支经济同盟”有赖于两国之间亲善关系的形成；而这种亲善关系的建立又是同两国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源连在一起的。他说：“每当我想到我所崇拜的孔孟列圣都是支那人，我对支那就有一种倍感亲近的感觉。这种个感觉，就像基督教徒对基督诞生地以色列的感觉一样充满敬慕之情。所以，日支亲善是我由衷的期望，并不惜为之作出最大努力”。²⁷正因为如此，他对蔑视中国的社会风气在日本的泛滥感到担忧，并为改变实业界对中国人的态度而不断地进行宣传，对日本政府对华实行的恩威并施政策也不时发表批评意见。尤其注目的是，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之时，涩泽荣一深感忧虑，认为这将使两国的经济关系受到巨大的打击。他说：“如非诉诸武力不可，那么日支实业关系将会毁灭，中日实业公司事实上将不得不面临中断职能的命运”。²⁸

²⁰ 《大陆开发与帝国国策》见《龙门杂志》第364卷24页

²¹ 《实现日支亲善之曙光》见《龙门杂志》第363卷30页

²² 《实现日支亲善之曙光》见《龙门杂志》第363卷26页

²³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 266P

²⁴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5页

²⁵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 183P

²⁶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 184P

²⁷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400-401页

²⁸ 见城佛治《涩泽荣一》日本经济评论社2008年171-172页

二十一条公之于世之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阶层反日情绪空前高涨，随之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抵制日货斗争，以至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完全陷入僵局。涩泽荣一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倡议成立了日华实业协会，并以该会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议书。这部题为《日支亲善方策之建议》的建议书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请求，其一、认为有必要将山东铁路改为两国国民合办事业，尽快撤走铁路守备队；其二、认为趁革命骚乱派遣的日本驻军继续留在支那无益于两国国交，且在有事之时，也难以达到保护在留日本人的目的，因此尽快将其撤离支那为得策。²⁹ 涩泽荣一在向日本首相原敬、外相内田康哉、陆相山梨半造面呈这份建议书时还特意做了这样的说明：“有关与支那关系的问题，目前最为希望的就是该国政界的安定。……长期以来，我国对支那的方针始终不相一贯，在列国环视之中暴露出外交政策不统一之弊，故此使帝国的威信大为下降，招致邻邦官民的疑惑和蔑视，以至让人误解为我国有领土野心、实行侵略主义。这实为遗憾之事。……按本协会会员依据多年实际经验所得出的判断，对支政策之根本在于支那自己的事情让支那人自己处理，而我国作为支那的友好邻邦，则应以维持始终一贯不渝的关系为要。即对于支那朝野的正当希望，日本不惜付出牺牲也应给以帮助。本协会对支那国民满怀诚意，求其谅解，排除一切障碍，决心坚持始终。并希望政府当局者谅解此意，确立对支那的方针，以期实现外交的统一”。也就是说，涩泽荣一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二十一条的提出不仅在外交上是个失败，而且并不符合实业界的实际利益。他甚至在后来还明确表明了反省态度，他说：“在对支那关系等方面，其方法就没有错误吗？在政治上，我是门外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可以另当别论，但如果站在经济的立场上来看，我认为可以说二十一条对支要求的确不是上策，支那排日风潮在其之后变得十分高涨的主要原因不正是在此吗？关于对支那的方针，我一直认为，不能唯以恩威处之，而必须以诚意和人情来对待”。³⁰ 由此可见，涩泽荣一在思想上所期待的是，日本选择一条“王道主义”的对外扩张路线，而不是“霸道主义”的对外扩张路线。

以上从不同方面对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做了概述，如果把他的中国观与前面两种主流中国观做一比较的话，即可看出他的中国观与福泽渝吉的中国观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同不仅包括他们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和态度的对立，也包括他们对中国在思想情感上的巨大反差和在政策主张上的明显不同。而与大亚洲主义却不乏共同之处。这表现为他们对儒学文

化传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性，并都把两国之间在地理位置的同一性当作建立同盟关系的出发点和依据，且都认为日本是理所当然的盟主。然而，在此特别应该说明的是，如果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共同点就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则无疑显得过于简单，也是不妥当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涩泽荣一的主张与“大亚洲主义”主流者的基本主张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和不同。其一、尽管涩泽荣一也把“同文同种”看成是密切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依据，但对大亚洲主义的“同人种论”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在《东大陆开发与帝国之国策》一文中将其视为僻见。其二、“大亚洲主义”主流者不仅主张经济扩张，而且积极鼓动政治和军事扩张，支持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恩威并施的对华政策。正是由于早就存在这样的思想特征，可以说主流的“大亚洲主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泛滥准备了思想条件。而涩泽荣一最感兴趣的是经济扩张，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之后，他对日本扩大军备多持保留态度，尤其对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形成和泛滥感到格外的担忧，认为有可能将日本引向灾难，因此他再三向日本政界和社会发出的一个呼吁就是“日本不要军国主义”。³¹ 总之，涩泽荣一的中国观虽同“大亚洲主义”有相近之处，但思想内涵上的诸多差别决定了它还不能被主流“大亚洲主义”所涵盖。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显示出了其独到之处，从而引起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涩泽荣一的“王道主义”对华扩张路线是欺骗？还是“空想”？

有关日本人中国观的先行研究比较丰富，而对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和“大亚洲主义”者的“亚洲一体论”，近年有学者曾在评论中指出：“从表面上看，‘脱亚论’与‘亚洲一体论’完全不同，前者千方百计要脱离亚洲，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分子，‘与西方文明共进退’；后者则鼓吹‘亚洲一体’，日本是亚洲一分子，必须与亚洲为伍，共同抵抗西方的侵略。他们对待亚洲文明的看法也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表面词句，去分析它们的本质，就会发现，这两种亚洲观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脱离’亚洲也好，‘领导’亚洲也罢，无疑都在鼓吹日本侵略邻国是合理的，是日本为亚洲的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不过是一个将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战争，看成是‘脱亚’的具体行动；一个则声称是为了亚洲整体利益，为了帮助邻国抵抗西方的侵略，为了亚洲的防卫。‘脱亚论’与‘亚洲一体论’，只是在为日本扩张政策制造借口方面有所不同而已”。³² 正如在本文前面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到的那

²⁹ 见城佛治《涩泽荣一》日本经济评论社2008年171-172页

³⁰ 见城佛治《涩泽荣一》日本经济评论社2008年170页

³¹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95页

³² 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社会科

样，尽管涩泽荣一的对华主张与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不同，与主流的“大亚洲主义”者在主张上也有区别，但其服务于对华经济扩张和侵略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因此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些主张看成是对中国这个被掠夺对象的一种麻醉和欺骗也是恰如其分的。然而，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对涩泽荣一一个人而言，他所提出的这些主张除了为日本设计了另外一种对华策略和路线，同时也反映了他自身在思想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需要，而了解这一点对于解读他主张的“王道主义”对外扩张路线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首先从时间上看，值得注意的是涩泽荣一“王道主义”对外扩张路线的提出大体是在明治时期宣告结束前的那几年。而在此之前，涩泽荣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日本采取的对华政策都是积极配合和支持的。1894年日本政府发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在战前的准备期间，涩泽荣一因捐献海防费用金两万元而受到嘉奖，获得金制黄绶保奖章。³³而在战争期间，涩泽荣一的表现更是活跃。为了使日本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不仅与福泽渝吉等人联合起来，共同组织成立了报国会，号召企业和民众捐款，以慰劳出征将士的家属，并慷慨解囊带头捐款以为国分忧。而后又直接接受了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委托，带领银行业承购了多达五千万的军事国债，³⁴同时个人还承购了三十万元的军事国债。³⁵1900年，日本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涩泽荣一为此而感到欣慰，在1901年日军将士返回日本之时，他作为发起人为日军将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在会上发表致辞。他说：“自去年七月以来，我日军将校远征北清，在这整一年之中，历经风雨饱尝艰难，完成了任务，使帝国之光辉大为发扬，我国民对此深表感谢，我将士军规严整，秋毫无犯，使日本军队的世界声望大为提高，并将永远留在我国民的记忆之中”。³⁶1905年，日本在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日俄战争中最终取胜，涩泽荣一更是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个值得日本举国欢庆的历史大事件。然而，在日本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所谓的“战后经营”进展的并不顺利。工商业界人士出于对战争接连不断的一种厌恶情绪，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表现消极，态度犹豫不前。为此，日本政府感到焦急不安，在公开对工商业界蔓延的厌战情绪进行指责同时，继续极力宣扬战争征服的思想。当时的大藏次官阪谷芳郎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一般国民中，为实业家最厌恶战争而又没有公开将其表露出来的勇气”，而“为推进我国对清、朝二国商工业之经营，第一需要者乃武力

也”，公然提出了“国旗先行论”，极力鼓吹只有对外实行武力征服，“才能确保日本商工业者之秩序、联合”。³⁷然而从结果上看，这些鼓动并没有给企业的对华扩张带来多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使涩泽荣一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即通过战争日本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战争并不能解决一切，战争本身也代替不了企业所进行的对华经济扩张活动，而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需要的是当地有较为持久的、平和的社会环境，否则企业活动将是无法预期的。而另一方面，作为对华经济扩张活动的组织者，涩泽荣一为了身先士卒，这时已经产生了在中国创办合资企业的想法，为此最为希望得到的是来自中国方面的配合，否则将难以实现。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涩泽荣一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意识到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认为日本以武力征服为基调的对华扩张路线已经难以适应需要，而走“王道主义”的对华经济扩张路线则应该成为日本的新选择。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的提出，对于涩泽荣一来说也是为了实现一种精神上的“释放”和满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涩泽荣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二重性格、在内心和精神上充满矛盾的人。他是日本财界的领袖，也是日本金融资本的化身，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与对外进行各种形式的扩张对于他来说不外乎是一种“生理”上的

本能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个性精神需要和情感追求的人，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使他把孔子当作是思想崇拜的对象，论语所主张的伦理道德已经被他看作是人生在世的精神信条；不仅如此，他作为日本的一个国民，也曾为日本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和侵犯而感到耻辱和愤恨，并投身过“倒幕攘夷”运动，因此对西方列强宰割之下的中国也不乏同情之心。正因如此，涩泽荣一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其追求经济利益的对外扩张行为作出符合精神需要的解释，或者说，如何用儒家伦理道德观为其对外扩张活动“正名”。也只有这样，作为儒家文化信奉者涩泽荣一才能从行动与思想追求的矛盾和冲突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释放”。

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个阶段，由于企业跨越过境、超越国家，不断追求市场、资源和利润，都需要本国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政策”。³⁸尽管涩泽荣一提出“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有其个人思想方面的背景，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因为在他看来，借用儒家的王道思想来阐释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对立，不仅对唤起日本国民和企业家对经济扩张活动的认同和支持具有重要

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82-83 页

³³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八卷，435 页

³⁴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五，563-564 页

³⁵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四卷，499 页

³⁶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八卷，460 页

³⁷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99-100 页

³⁸ 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3 页

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带来日本军费开支和企业纳税负的减少，给国内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此外，对缓和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改善在华的日资企业和合办企业的社会环境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在涩泽荣一看来，这是一条比“霸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更为符合日本企业经济利益要求的路线。然而，无论是日本政界还是日本财界，在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才是企业需要本国为其提供的服务政策这一根本问题上，各方面的认识毕竟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尖锐的意见对立。而在那些主张“霸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的政界首脑人物眼里，尽管“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有可取之处，但在强权和武力征服决定一切的时代，它或许只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空想”，并不足以切实保证日本在华的权利要求。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涩泽荣一的对华主张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和垄断财阀所完全理解和接受，对此他颇感遗憾和忧虑，但与日本政府和垄断财阀之间的密切合作并没有受到影响。